

汉语语法欧化综述

谢耀基

(香港大学中文系 香港)

摘要:汉语语法的欧化,可说是汉语语法史上一桩大事。文章从欧化的成因、现象和规范三方面作一综合评述:一、汉语语法自20世纪以来的急速欧化,显示了语法发展的语言因素和社会因素,也寄托了不少语文工作者的期望;二、汉语语法的欧化,通过词、语、句的结构变化,主要表现在新形式、新用法的产生,以及旧形式、旧用法在应用范围和使用频率方面的增加;三、欧化有恶有善,如何消除恶性、加强善性,联系着人们对欧化的辨识、态度、取向、原则等;进行规范,可以把要求和标准分开。

关键词:欧化;语言因素;社会因素;现象;善性;恶性;规范

中图分类号:H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79(2001)01-0017-06

一 欧化的语言因素和社会因素

王力说:“文法的欧化,是语法史上一桩大事。”(王力 1954,258)^①自20世纪初的国语运动以来,从文言发展到当时的旧白话,再从当时的旧白话规范到现在的新白话,汉语语法在这数十年间的变动比由汉到清的可以说还多。对于一向渐变的语法来说,汉语语法的急速欧化,凸显了语法发展的语言因素和社会因素。

语法是语言的结构规律,反映使用该种语言的社会群众的思维规律。思维规律的共同性和联系着表达形式的习惯性,使语法跟语音、词汇比较起来,出现较少的区域差异,有较大的稳定性。但是,这不表示语法没有变动。一方面,语言本身有发展需要。活的语言需要不断作出调整,吸取新的养分。不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汉语一向都有经过选择,加以吸收,并且汰旧立新,在稳定中不断演进,以求精炼、丰富,满足日益复杂的交际要求。另一方面,语法虽然倾向于渐变,但也跟语音、词汇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且,发展速度跟社会发展速度密切相关。自17世纪西学东渐,欧西语言的影响与日俱增。鸦片战争以后,政治、经济、社会急剧变化,中外语言、文化交流频繁。国语运动前后,语文工作者在写作、翻译以及语法研究等方面大量模仿、借用外来成分,对汉语语法的发展,都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大胆的欧化,可说是白话文学的倾向”,作家的作风“早已带有不少的欧化成分”(赵家璧 1972,导言,24)。翻译跟汉语欧化关系更为直接。欧化的来源

有说就是翻译(王力 1954,258)。翻译时,“想尽量表达原文的意思,必须尽量保存原文的语句组织”;这样,“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现代言语”,借着“输入新的表现法”,使“中国现代文更加精密、清楚和丰富”(罗新璋 1984,454;266;285)。鲁迅的直译,“宁信而不顺”,有意加入些异样的外国的句法,便是一个例子。至于语法研究,“语法学是19世纪末从西方传入的。所以汉语语法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印欧语语法的深刻影响。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大都是模仿印欧语语法的”(朱德熙 1985,日译本序,3)。张志公说:“这八十年来,我们的语法研究,不管哪种体系,不管哪一家,共同的不足的地方就是始终没有摆脱西方语法学的羁绊。”(张志公 1991,490)语法学家模仿、借用欧西语言理论来描写汉语语法,引介欧西语言组词造句的规则,增进国人对欧西语法的认识,帮助推动了中西语言的接触和发展。汉语的欧化,如生活的欧化般,是潮流所趋,势所难免。在当时欧化热潮的冲击下,新事物、新概念的涌现,新时代的新需求,催生了大量新的表现形式和用法。

二 词法和句法的欧化现象

汉语语法的欧化,显示了汉语语法近八九十年来的发展。就词的构成来说,用汉字表音不表义的音译式造词法,产生了大量多音节单纯词(如“马达 motor、凡士林 vaseline、盘尼西林 penicillin、烟士披里纯 inspiration”),而音译语素也可跟其他语素复合

成词(如“坦克车、沙发床、奥林匹克村”)。此外,受欧化影响而兴起使用的词缀不少,例如用法跟英语“counter-,anti-”相当的前缀“反”(如“反革命、反宣传”),跟“-ism”相当的后缀“主义”(如“资本主义、浪漫主义”),跟“-ty,-cy,-ship,-hood,-ness”相当的“性”(如“纪律性、重要性”),跟“-ize,-ise”相当的“化”(如“现代化、欧化”)。汉语原有词缀部分亦广泛应用起来,例如用法跟“-er,-ian,-ist,-or,-eer”等相当的后缀“家”(如“作家、科学家”)、“者”(如“读者、作者”)、“师”(如“魔术师、工程师”)、“员”(如“教员、演员”)。附加式构词,既有单个词缀与词根组合,也有超过一个词缀跟词根组合(如“可靠性、理性化、反阶级主义者”)。词的形态变化方面,结构助词“的、地、得”要明确分工,依次作定语、状语和补语的语法形式标志;^②动态助词“了、着、过”黏附动词后面,使能像外语准确表示时态般表示动态;复量助词“们”一方面如“-s,-es,-ies”等黏附在指人的名词或代词(“我、你、他”)后面表示复数,一方面扩大了应用范围,连非指人代词“它、牠”都可以加上。词类方面,受外语冠词(article)影响,连没有强调数目需要,也喜使用数词“一”,并跟量词“个、种”等套用。^③人称代词的多用,以至由原本不分性别的“他”衍生出“她、它、牠、牠”,是受了外语结构上的需要及有阳性(masculine)、阴性(feminine)、中性(neuter)区别的影响(如英语“he,she,it”)。^④印欧系语言注重形合,汉语的连词也多用起来,其中“和”跟英语“and”用法因看作相同而变得不可缺少,在语句的位置也由插在分类之间(如“我喜欢吃饼干、蛋糕和苹果、香蕉”)固定在所连结的最后两项之间(如“我喜欢吃饼干、蛋糕、苹果和香蕉”)。外语多用、须用介词,汉语介词的应用,由“随便”转为“需要”,例如“在……”(相当于“in,on,at”等)、“当……的时候”(相当于“when,while”)、“关于、对于”(相当于“about,with regard to,in connection with,with related to”等),便大量使用起来。

词的组合方面,结构趋向复杂。例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性结构共同支配一个对象(如“仔细观察、详细分析并且认真处理问题”),动词前面连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助动词(如冰心《闲情》:“我不能,也不肯忙中偷闲”),判断动词后带的宾语由用连词连结的联合短语充当(如郑振铎《离别》:“两岸是黄土和青草”),人称代词、专有名词前面加上修饰成分(如苏雪林《山窗读书记》:“像长年干着粉笔黑板营生的我们”;秦牧《海滩拾贝》:“那个从落地的苹果悟出万

有引力的牛顿”),偏正结构中偏项使用长串的、多层结构的词语,不作分说(如阿英《盐城杂信》:“这是交通不便的往昔的到浙江省城的唯一的重要的道路”),主谓结构中间插入“的”字,把结构转成偏正,并带有名词语法功能(如茅盾《狂欢的解剖》:“他们的要求乐观现世”;曹白《祖父》:“故乡赵庄人的唱这首歌”)。^⑤这些组合法都受到外语语法的影响而流行使用起来。

句子方面,结构也起了一些变化。例如,汉语是简洁的,只要不妨碍理解,句子成分可省则省;受到英语句子结构形式的影响,汉语句子里的主语,往往可省不省(如郑伯奇《悼聂耳先生》:“他虽然得了这样的成功,他却一点也不自满,想到国外去求深造;不料在第一段旅程上,他就作了无名的牺牲了”)。^⑥汉语是意合的,但受印欧系语言注重形合影响,关联词语的使用便由“随便”变得“需要”(如郁达夫《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我因为还要去教书,所以没有许多工夫,和你谈天”)。汉语的复句,一般是偏句在前,正句在后,现时则多了偏句后置(如靳以《造车的人》:“他仍然是贫困的,虽然他每天都是勤苦地工作着”)。叙述对话,语序多了变化,说话者由一般置于话前而可置于话后(如巴金《一件小事》:“‘爸爸,回家去?’孩子胆怯地问父亲”)或插在一段说话之间(如吴组缃《黄昏》:“‘三太太,’我诧异地问:‘她不是有个赚钱的好儿子?’”)。插语法多用起来,并且由传统的插在句前而可放在句子中间(如老舍《想北平》:“这样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经验中——天下第一了”),由一般插进一两句不相干的话而可表示注释、补充(如鲁迅《女吊》:“一到‘跳吊’时分——‘跳’是动词,意义和‘跳加官’之‘跳’同——情形的松紧可就大不相同了”);组织看似松散了一些,语义却较为严密。至于句式运用,最明显的是表示被动的“被”字句普遍使用起来,“被”字句表示的也不限于不愿意或不愉快的事情(如老舍《骆驼祥子》:“河水被晚霞照得有些微红”;赵树理《传家宝》:“金桂被村里选成劳动英雄……李成又被上级提拔到区上工作”;鲁彦《我们的太平洋》:“后湖便被我喜欢了”)。“是”字主要表示判断或起强调作用,但现时不管是否表示判断或需要强调,“是”的使用变得如英语“be,is,am,are”般普遍和必需(如俞平伯《重过西园码头》:“雨虽暂时不下,地上是稀湿”;聂绀弩《怀南京》:“啊!一个人的变化是太大了!”)。

总括来说,汉语语法的欧化主要表现在新形式、新用法的产生,以及旧形式、旧用法在应用范围和使

用频率方面的增加。这些新用法的产生和旧用法的增加,其实寄托了不少语文工作者的期望。20 世纪早期的语文工作者,往往把欧化等同现代化、国际化,企望欧化能够充实、改良他们当时认为是异常质直、干枯、贫乏的白话文,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例如,瞿秋白提出文艺工作者要天天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鲁迅和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瞿秋白的来信》,见罗新璋 1984,269)朱光潜表示欧化是扩充和精练白话的一个方法(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见朱光潜 1961,114—115);傅斯年认为“西洋人的表示法尽多比中国人的有精神。想免得白话文的贫苦,惟有从他——惟有欧化……理想的白话文就是欧化的白话文”(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见赵家璧 1972,250—251);鲁迅主张“中国语法有加些欧化的必要”(鲁迅《康伯度答文公直》,见鲁迅 1981,522),强调“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鲁迅《玩笑只当它玩笑〔上〕》,见鲁迅 1981,520)。他们的欧化主张和理论,在当时西化热潮的冲击下,部分难免过度卑己崇洋,忽视了中国语言文字本身的优点。不过,他们要求语言配合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洋为中用,这种要对语文革新的坚持,正是推动汉语欧化的动力。

三 欧化的善与恶

汉语需要吸收外来成分,不必争论,但这不表示欧化没有问题需要解决。50 多年前,朱自清指出“中国语的欧化或现代化已经二十六年,该有人清算一番,指出这条路子那些地方走通了,那些地方走不通”(王力 1985,朱序,12)。可是,这样的清算,至今仍未容易算得清。对于汉语欧化,反对的不比赞成的少,正由于欧化本身就有“恶性”和“善性”两面影响。

善性欧化,指借用外语形式、用法,能够取长补短,“欧而能化”,增强汉语的表达能力和效果。例如,汉语利用欧化词缀构词,丰富了汉语附加式的构词法,也明确标示词性(如加“性”表名词,“化”表动词),增加词性转变的灵活性(如用“性”把动、形名化,用“化”把名、形动化)。由“he, she, it”引发出来的“他、她、它”,口语虽同样读作 tā,书面语就能表明指代人物的性别,减少累赘、误会。此外,“如‘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的学习榜样’、‘进行了并正在进行着建设’等格式,都已经被吸收过来,使我们的语言更为精密、准确,更富于表现力了。”(胡裕树 1995,15)复杂的附加成分,可长而不冗,密

而不乱,使句意一气呵成。适当地加插“之一(相当于英语“one of”)、依我看来、比较来说”等,可使“说话有分寸”(王力 1954,283—286)。善性欧化,除了使汉语的结构更加严密,意义更加明确,也能丰富汉语的表现力。郭绍虞说:“口头的话与笔底的文既不能十分符合,所以可以古化,同时也可以欧化。古化成为古文家的古文;欧化,也造成了新文艺的特殊作风。白话文句式假使不欧化,恐怕比较不容易创造他文艺的生命。‘我站在树旁’,的确不如说‘站在树旁的我’;‘许多人从大礼堂走出来’,的确不如说‘大礼堂吐出了许多人’;‘泪光滢滢,似表谢意’,的确不如说‘从两眼滢滢的泪光中,射出感谢我的笑意’。”(郭绍虞《新文艺运动应走的途径》,1963,99—100)

恶性欧化,指仿用外语语法,陷于乱用、滥用,^①“欧而不化”,写出不中不西的语句,使汉语不通、不简、不洁。滥用外来词语,语句中西夹杂,最为人诟病(如胡适之《老章又反叛了!》:“但他学的不澈底,他不知道一个真正 gentleman 必须有 sportsmanship,可译为豪爽”)。任意利用词缀构词,或径依外语词直译,容易弄成造词生硬(如“乡村化、考虑性”)和滥用(如“犯了严重性错误”)毛病。词类运用方面,如动态助词“着”,即使动词本身含持续意思(如“爱、相信、需要”)或完结意思(如“答允、得”)甚至不表具体动作、行为(如“有、充满”),往往都黏附后面,表示动态。结构助词“地”附在已有“然、样、般”等字的副词或形容词后面(如“突然地、同样地、一般地”),不仅重复语义,亦不合汉语习惯。复量助词“们”表示众数,不作数量定指,但对照外语,就有“五个学生们”的用法,甚至连“群众、观众、军队”等已含复数的也加上“们”;此外,没有修辞需要,对可有复数名词都随意加用(如“小动物们、星星们”),造成“们”的泛滥。为了区分性别,人称代词出现“他(她)们、他们和她们、他们或她们”及“妳、妳、妳”一类写法,白白增加语言的负担,说写起来都觉别扭。人称代词用来表示领属,受了外语影响,本来不必用的也变得非用不可(如曹白《向孩子们告别》:“我不得不低下我的头”;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爱热闹的少年们携着他们的女友”)。数词加量词“一个、一种”等看成如英语不定冠词般必需,弄出“我像是一个溺在水里的儿童”、“这是一种不怕风险积极进取的表现”的语句。有人举出“与茅盾同行的田汉,是一位有名的戏剧家”,认为这句“怕读者误会是和多人同行,因而加上‘一个’,最属庸人自扰,难道田汉是孙悟空,脚毛会吹之成兵?不要‘一位’两字,岂不

更好”(胡菊人 1979,75)。介词“在”容易滥用,也易套上“前、后、上、下、左、右、内、外、中、旁”等方位词(如冰心《寄小读者》:“在今晚日落之前,我便可在一个小海岛之上”),过量使用,造成“十面埋伏”。“当她十六岁的时候,就从乡下到了上海”不及“她十六岁就从乡下到了上海”来得干净利落(吕叔湘、朱德熙 1979,104);把“当……的时候(时)”看成英语“when,while”,任意滥用,“五步一当,十步一当,当当之声,遂不绝于耳了”(余光中《翻译和创作》,见罗新璋 1984,749)。“有关、关于、对于”等介词可省不省(如“我去访问校长请他谈谈有关学校失窃问题”),“用得太多,文句的关节就不灵活”(余光中 1979,3)。句子组织方面,欧化的句子或由于句子成分可省不省,或多用关联词,或附上长串的修饰成分,使句子加长,容易造成句子臃肿和结构纠缠不清的毛病。汉语表示被动,有多种形式;受到英语被动句式影响,“被”字句大量应用,把连已属自然表明被动关系的被动句也添上蛇足(如“水被喝光了”、“文件被放在桌子上”)。

梁启超把小说比作空气、食物,在社会“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好的小说能改良群治,坏小说就毒害人心”(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70,273—274)。语法欧化,也有好坏之别。善于西化,便能吸取外来养分,滋养汉语,增强汉语的严密性和表达能力;但是,一失调节,造成恶性西化,只会弄出毒物,损害汉语意合、简洁等特性,削弱汉语的交际能力,阻碍汉语健康发展。对于欧化,有人反对,有人赞成;说到底,反对的着眼于恶性欧化,赞成的着眼于善性欧化。不过,无论反对还是赞成,汉语的欧化是既成事实,也是语言的一种发展,有语言因素和社会因素支持。现在的问题,最重要的应该在怎样消除恶性,加强善性,避免未见其利,先受其害。

四 欧化的规范问题

汉语的一些新形式和新用法,是由欧化而来,还是属于汉语本身发展而来的,区分并不容易。语言通过比较,有异有同。说汉语某些形式、用法欧化,有可能是偏重了异处,忽略了同处。现代汉语发展历史不算悠久,某些形式和用法(如短语的复杂结构,偏句后置、叙述对话和使用插入语等语序变化),可能只是在内部发展的过程中后于外语,未必是受到外语影响才产生的。此外,对于欧化成分,固然要认清哪些合乎语法规范,哪些不合规范,同时,还要认清哪些用于口语,哪些见于书面语;哪些是普遍的、一般的用例,哪些是个别的、特殊的用例,只流行

于一时一地。弄清楚新形式、新用法的身分以及使用情况,规范工作会事半功倍。

汉语的一些欧化形式和用法,是恶是善,也不容易取得共识。首先,接受欧化的程度,很多时难免存有宽紧之别。例如“着”,有认为用不用“着”应该视乎动词本身的含义可否表示持续或进行,但也有认为要考虑的是语法格式而不是词汇意义,“着”的用法越来越“词尾化”,加在动词后,就能表示持续的语法意义,所以不可轻易否定(胡瑞昌 1986,123—124)。又如“之一”,有认为可以帮助使语义明确合理,也有认为没有需要使用,只属于“自卫性”的说法,在层层自我保护的制约中,缚得自己紧密,以求找不出半点为人攻入的缺口(胡菊人 1979,69)。指示代词“前者、后者”,有人接受、喜用,认为可以节省语言,但也有人认为不好使用,“一来并非口语化,二来因为用得不好,反而容易引起误会”(孙述宇、金圣华 1976,62)。至于介词“当”,有的语法书认为只能说“当……时”,不能说“当……之前”、“当……之后”,有的却就接受,并且指出在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中已常出现(参邓福南 1980,2—3)。

其次,语言习惯是可以改变的。随着社会变动,现时一些“欧而不化”的形式和用法,若干年后,也许就为群众接受,变得“欧而能化”。例如,“它们”违反“们”只用于某些指人名词(如“学生、作家”)和人称代词(如“你、我、他”)的限制;“您”表复数,用“您们”(“您们”本来口语不用,书面只间或出现)而不在后面加数量词(如“您三位”);“当……时”相当于英语的“when,while”,“当……之前”、“当……之后”有时态混杂矛盾之嫌;“有”不表具体的动作行为,后面却有加“着”来表示“持续”的语法意义。这些用法,使用的人越来越多,经过一段时间,难保不成习惯。语言习惯的渐变性,会影响欧化的形式和用法在某段时间内是否为群众接受。

欧化的形式和用法是恶是善,还要结合语言的实际应用情况来看。不必用而用,是滥用,但是否滥用,在不同语言环境会有不同的接受程度。例如,日常交际口语要求简洁,讲求意会;法律条文、科技论文要求严密,倾向形合。这样,句子成分甚至语法形式标志(如关联词语表语义关系、“们”表复数、“被”表被动、“着”表动态)等可省不省,从汉语的简洁性看,是滥用;从严密性看,却会是需要。“经济”、“准确”都是语言交际的基本原则,一是两者兼得,一是需要取舍。“汉语天秤上如何摆放,使两边平衡,同时兼顾它的简洁性和逻辑性,也还是颇费踌躇的。”

(李家树《汉语的天秤如何摆放》,1991,269)

无论如何,汉语语法欧化的规范问题,需要正视。早在1921年,陈望道已经提到:“中国原有的语体文,太模糊而不精密,又有许多处所,说法很不方便,文法需要改进之处也很多。所以凡是思想精密,知道修辞、了解文法的人们,一定不会反对语体文底欧化,而且认为必要。但欧化决不能像某报一般,做了些不通的文言,就算是新的文言,使人看了不知所谓,而他们又有法遁于非议。所以我以为一面提倡欧化,一面就该提出限制条件。”(陈望道《语体文欧化的我观》,1980,64)我们固然不应该采取深闭固拒的态度,却也不能让盲目欧化的人牵着鼻子走。要避免生吞活剥,杜撰硬搬,就要“从外国作品中去吸收新的语汇和表现方法,必须是在本国语言的基本语汇和基本语法的基础上去吸收而加以融化”(叶蜚声、徐通锵1981,219)。朱光潜说得好:“采用欧化的作者有两点须特别留意。头一点是不要生吞活剥。各国语文都有它的特性(法国人所谓 *genie*),我们在大体上不能违反它。如果一句话依中文习惯可以说得同样精确有力,我们就绝对不能欧化它,欧化须在表现上有绝对必要时才可采用。第二点是不要躁进僭事。语文是逐渐生长的,我们不能希望一个重大的变动一蹴而就。一个作者的语文,如果欧化到一般读者不易了解接受的程度,那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群众需要按部就班的训练。这一代所认为欧化的,下一代就习惯成自然;这一代欧化得轻松一点,下一代欧化得彻底一点,如此逐渐下去,到适可程度为止,也许可以免除许多固执者的少见多怪。照我看,这是自然的大势所趋。”(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1961,114—115)

“不要生吞活剥”、“不要躁进僭事”,可说是善性欧化的两个窍门。进行规范,我们不妨把“要求”和“标准”分开;要求定得低些,标准定得高些。从低一些的要求说,是尽量避免滥用、乱用欧化语句,“不必用的就不用”,以遏止语言的污染;从高一些的标准说,是能够在易懂、简洁、必需的原则下,符合汉语的个性和使用习惯,恰当地吸取外语的养分,“可用的就不妨用”,融入本身语言之中。在起步的阶段,最要注意欧化合不合汉语规律,既不要全盘接受,也不必刻意净化。至于往后能否正确地“洋为中用”、“化西为中”,那就是我们致力的目标,也是汉语发展的方向。

附注:

①王力说:“所谓欧化,大致就是英化,因为中国人懂英

语的比懂法德意西等语的人多得多。”(1985,334)

②二三十年代,有人受英语所有格(*possessive case*)的影响,主张用“底”来表示领属关系,置于名词性定语后面(如“他底身体、大众底意愿”),用“的”作表示修饰关系,置于形容词性定语后面(如“聪明的学生、愉快的一天”)(参吕叔湘《论“底”、“地”之辨兼及“底”字的由来》,1955,51—58)。不过,这种分工没有普遍为人接受。

③依汉语使用习惯,“‘个’字之前省‘一’”的倾向较其他单位词之前为甚”(吕叔湘《“个”字的应用范围,附论单位词前“一”字的脱落》,1955,93)。王力指出,无定冠词是汉语最容易接受的,“在法语和德语里,无定冠词是借用数字‘一’字(法语 *un, une*, 德语 *ein, eine, ein*)来表示的;在英语里,无定冠词虽然不是借用数词‘一’字来表示,但是它所用的 *a, an* 也带有‘一’的意思。用‘一个’、‘一种’之类来对译,实在方便得很。久而久之,我们写文章,也喜欢用‘一个’、‘一种’等”(王力1958,464—465)。

④陈望道曾提出用“他们”表示男性,“伊们”表示女性,“渠们”表示通性,“彼等”表示中性(陈望道《用字新例》,1980,71—73)。

⑤王力指出:“我们知道西洋语法里的行为名词是很多的。英法语以 *-tion, -ment* 等收尾的词,德语以 *-ung* 等收尾的词,俄语以 *-ение, -тие* 等收尾的词,基本上都是属于行为名词一类的。”(王力1958,398)翻译外语以及把汉语动词转作行为名词最简便直接的方法,便是使用在动词前面加上“的”而转带名词语法功能的偏正结构。

⑥王力说:“通常中国语可以不用而欧化文章一定要用的主语只有两种:第一,是承说的省略和习惯的省略;第二,主语该是一般人,并不限于某个或某一些人。”(王力1985,342)

⑦吕叔湘、朱德熙谈及“实字”、“虚字”的运用时,提出不要滥用、乱用,这正好用来说明恶性欧化的一些因由。他们说:“要防备的,一是乱,二是滥。不必用而用,是滥用。该用甲字而用乙字是乱用,就乙字本身说也是滥用。语言总是处在不断变动之中……一种新的格式的兴起,必然是应合某种客观的要求,但是正因为它是新的东西,没有传统的标准,而厌旧喜新又是人之常情,所以新的格式最容易流于乱用和滥用,也就是我们最应该小心的所在。”(吕叔湘、朱德熙1979,66)

参考文献:

- [1]陈望道.陈望道语文论集[C].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
- [2]邓福南.汉语语法专题十讲[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 [3]郭绍虞.语文通论[M].太平书局,1963.
- [4]胡菊人.文学的视野[M].明窗出版社,1979.
- [5]胡瑞昌.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M].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
- [6]胡裕树.现代汉语(重订本)[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 [7]李家树. 语文研究和语文教学(增订本)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8]梁启超. 饮冰室全集 [M]. 文化图书公司, 1970.
- [9]鲁迅. 鲁迅全集(第5卷) [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0]吕叔湘. 汉语语法论文集 [C]. 科学出版社, 1955.
- [11]吕叔湘, 朱德熙. 语法修辞讲话 [M].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9.
- [12]罗新璋. 翻译论集 [C]. 商务印书馆, 1984.
- [13]孙述宇, 金圣华. 英译中——英汉翻译概论 [J]. 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 1976.
- [14]王力. 中国语法理论(下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 [15]王力. 汉语史稿(中册) [M]. 科学出版社, 1958.
- [16]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 [M]. 商务印书馆, 1985.
- [17]谢耀基. 现代汉语欧化语法概论 [M]. 光明图书公司, 1990.
- [18]叶蜚声, 徐通锵. 语言学纲要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 [19]余光中. 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 [J]. 明报月刊, 1979 (164).
- [20]张志公. 张志公文集(第1集) [M].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1.
- [21]赵家璧.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集) [C]. 香港文学研究社, 1972.
- [22]朱德熙. 语法答问 [M]. 商务印书馆, 1985.
- [23]朱光潜. 谈文学 [M]. 文艺出版社, 1961.
- (责任编辑 沈慧云)

粤北土话及周边方言国际研讨会在韶关学院召开

粤北土话及周边方言国际研讨会于2000年11月6—9日在韶关学院召开。这次研讨会是由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和韶关学院联合主办, 韶关学院具体承办的。来自中国大陆、香港特区和法国、韩国、日本的方言学者共52人, 出席了会议。

开幕式由本次会议召集人、韶关学院方言研究所所长李树俨教授主持。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长熊正辉教授、《方言》季刊主编张振兴教授、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秘书长周磊博士、韶关市副市长杨春芳女士、韶关学院领导林立芳教授、徐剑副教授等出席了开幕式。

熊正辉会长致开幕词。他指出, “对我们汉语方言学来说, 对湖南、广东、广西三省区交界处的土话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 其科学价值不亚于地质学对新的冰川和大峡谷的发现和考察, 不亚于考古学对秦始皇兵马俑的发掘。”他还代表与会同行祝贺韶关大学升为本科学院。

杨春芳副市长、林立芳教授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们分别代表韶关市人民政府和韶关学院师生员工热烈欢迎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 并相信这次会议不仅将大大促进粤北土话及周边方言的研究, 也将进一步推动韶关市和韶关学院的改革发展。

大会先后宣读了40篇论文, 并逐篇进行了讨论。描写粤湘桂三省区土话的论文最多, 且集中在音韵方面, 材料扎实, 可看出土话内部有不少共同点, 但差异也非常大。讨论土话与周边方言关系的论文, 虽然观点仍不一致, 但比以往思路要开阔得多, 认识要深刻得多。整个会议的进程紧张而又热烈, 各种学术观点都能在平等讨论中得到交流。大家认为, 土话的研究尚处于全面启动阶段, 特别需要三省区及国内外同行协同作战, 联合攻关。

林立芳教授主持了闭幕式。张振兴教授在总结发言中充分肯定了韶关学院方言研究的成绩, 并代表与会学者对韶关学院为开好这次会议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他特别强调, 土话的研究要多作单点的全面深入的调查, 为多方言的比较研究打好基础, 这样才能搞清楚土话与周边方言的关系。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L S Y)